

金代女真人服饰的变化

刘杰

(渤海大学 政治与历史学院, 辽宁 锦州 121013)

摘要:金代女真人的服饰由早期到入主中原后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为:服饰制度的形成;整体上看,女真人服饰由简朴渐变奢华;汉化倾向明显;并且具有严格的等级性。女真人服饰的变化与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多民族文化的交流密切相关。

关键词:金代;女真;服饰变化;经济发展;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K 24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91X(2013)06-0561-04

Changes of Jurchen costume in Jin Dynasty

LIU Jie

(Schoo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Bohai University, Jinzhou 121013, China)

Abstract: Jurchen costume experienced changes from early stages to the period after they had settled on central plains. Findings show the following changes: a costume system formed, simplicity gradually given way to luxury in style, obvious tendency of costume Chineseization and a strict costume hierarchy established. These chang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in Dynasty and the multiracial culture exchange.

Key words: Jin Dynasty; Jurchen; costume change; economic development; cultural exchange

0 引言

服饰是人类社会演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仅是物质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精神文明的重要表征。服饰能折射出一个民族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兴衰轨迹。金朝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女真族所建立的政权,受金代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金代的女真人服饰由早期到入主中原以后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本文试图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对金代女真人服饰的变化作简单的分析。

1 女真人服饰发展的两个阶段

1.1 女真人早期(传统)服饰

女真是我国古代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之一。女真人及其先人所居住地区冬季寒冷而漫

长,加上早期社会生产力落后,所以早期女真人服饰是衣着动物的皮、毛,以及麻布。如洪皓在《松漠纪闻续》中记载:“北方苦寒,故多衣皮。虽得一鼠亦褫皮藏去。妇人以羔皮帽为饰,至直十数千。敌三大羊价。不贵貂鼠。以其见日及火则剥落无色也。”^[1]《大金国志·男女冠服》也记载:“土产无蚕桑,惟多织布,贵贱以布之粗细为别。又以化外不毛之地,非皮不可御寒,所以无贫富皆服之。富人春夏多以紵丝锦絀为衫裳,亦间用细布。秋冬以貂鼠、青鼠、狐貉皮或羔皮为裘,或作紵丝四袖。贫者春夏并用布为衫裳,秋冬亦衣牛、马、猪、羊、猫、犬、鱼、蛇之皮,或獐、鹿皮为衫。裤袜皆以皮。”^[2]另外,《三朝北盟会编》也记载:女真人“其衣布好白,衣短巾而左衽……富者以珠玉为饰、衣黑裘、细布、

收稿日期:2013-04-24

作者简介:刘杰(1988-),女,河北沧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辽金史的研究。

貂鼠、青鼠、狐貉之衣。贫者衣牛、马、猪、羊、猫、蛇、犬、鱼、蛇之皮。”^[9]

通过上述记载我们可以看出,金朝初期女真人的衣着主要以动物皮毛和麻布为原料,秋冬季节,无论贵贱之人都穿毛皮衣,但不同的是,富人以高贵的貂鼠、青鼠和狐等猎物皮为裘,而贫者则衣着较低廉的牛、马、猪、羊等家畜皮。裤、袜、帽等也是用动物毛皮制作的。春夏富人衣着紵丝(用苧麻织成的布)、锦絀(棉布)、细布,而贫者只能穿用粗麻布制作的服装。

1.2 入主中原以后女真人服饰的变化

女真人建立金朝以后,先后以武力征服了辽朝和北宋,进入中原地区。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女真人的服饰较前期有了较大变化。女真人服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服饰制度的形成。金朝初期,还没有严格的服饰制度,女真人进入燕地后,便开始模仿辽朝的统治制度,分南北官制,重视服饰礼仪制度。熙宗即位以后,不仅对官制进行了改革,同时对礼仪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史载:“天眷二年(1139年)四月,百官朝参,初用朝服”^[10]。六月,熙宗“初御冠服”^[11]。天眷三年(1140年),“熙宗幸燕,合用通天冠、绛纱袍”^[12],标志金朝服饰制度初步确立。皇统七年(1147年)再定诸臣祭服,世宗大定三年(1163年)又定公服之制。章宗时,“参酌汉、唐,更制祭服”^[13],金代服饰制度经过多次变化,至此才最后完备。金代女真人服饰上自皇帝,下到百官礼服,是参照历代服制制定的,包括天子之服、视朝之服、皇后冠服、皇太子冠服、宗室及外戚并一品命妇、百官的朝服、祭服、公服、常服。其中,皇帝、皇后、官员等女真人的服饰纳入金服饰制度中。最能反映女真人服饰特点的是常服,主要包括巾、盘领衣、带和乌皮靴四部分。

其次,女真人服饰由简朴变奢华。金初,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女真人早期的服饰比较简朴。正如史书中所记载:“国初风俗淳俭,居家惟衣布衣”^[14]。入主中原之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女真人的服饰也逐渐变得奢

华。在服饰材质上,丝织品已经成为女真服饰必不可少的用品之一。通过《金史·舆服志》可知,女真人的服饰包括罗、纱、绫、绢、丝绵等各种丝织品。1988年,黑龙江省阿城市巨源乡城子村的金代齐国王墓所出土的服饰,为我们研究金代服饰提供了最真实的资料。墓中出土男女服饰三十余件,服装原料品种齐全,有绢、绸、罗、锦、以及绫、纱等。齐国王墓发掘简报指出:这些丝织品“蚕丝质量好,丝线粗细均匀,有光泽,织品经纬排列细密,弹性任性良好。织品精湛,大量采用挖梭技术,织金品占有相当数量,有织金绸、织金绢、织金锦等。”^[15]这个墓出土的丝织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代女真贵族服饰的奢华。有金一代,不仅女真贵族衣着奢华,就连有的显贵之家的婢妾居然“衣缕金绮绣如官人”^[16]。由于金代社会奢华之风大兴,世宗时期,就有吏部尚书梁肃请立衣服禁疏:“民间钱难,盖有风俗奢华所致。今则吏部卒贩奴仆之贱,各衣罗纨绮绣,服带金鱼,以致钱货尽入富商大贾及兼并之家。拟乞严行禁约,明定服色。”^[16]

再次,女真人服饰汉化倾向明显。女真人占领中原地区以后,受汉人和契丹人的影响,在服饰上也呈现出汉化的趋势。熙宗,“雅歌儒服”,“海陵王完颜亮“见江南衣冠文物,朝仪位著而慕之”,便集中反映了女真衣着汉化的趋势。^[16]

出使金朝的宋人的行记中也有女真人服饰汉化的记载,如《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九引范仲熊《北记》:“凡番官平居著上领褐衫,无上下之辨,富者著褐色毛衫,以羊裘狼皮等为帽。传闻粘罕二太子初入中国时,止著褐衫。既拔京城,其下无不衣锦绣。至月旦及视事,则幞头、公服、靴、笏,皆如中国之制。”^[17]

女真人服饰的汉化从女真妇女服饰也可以反映出来,史载:“妇人服檐裙,多以黑紫,上编绣全枝花,周身六襞积。上衣谓之团衫,用黑紫或皂及绀,直领,左衽,掖缝,两傍复为双襞积,前拂地,后曳地尺余。带色用红黄,前变垂至下齐。年老者以皂纱笼髻如巾状,散缀玉钿于上,谓之玉逍遥。此皆辽服也,金亦袭之。”^[18]此外,女真妇女的巾饰也反映了女真人衣着汉化的趋势,“自灭辽侵宋,渐有文饰,妇人或裹逍遥巾,

或裹头巾,随其所好”^[2]。由于女真人纷纷着汉人衣冠,女真统治者为了保护女真旧俗,曾颁布命令,禁止女真人学习汉人装束。如金世宗在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就颁布敕令,“禁女真人学南人装,犯者抵罪”^[4]。章宗时期也有类似的规定,泰和七年(1207年),“敕女真人不得改为汉姓及学南人装束。”^[6]此外,《金史·舆服志》中也记载:“初,女真人不得改为汉姓及学南人装束,违者杖八十,编为永制。”^[6]统治者三令五申,颁布敕令,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了女真人喜穿汉服已成风。

最后,女真人服饰具有严格的等级性。“女真之初,尚无城郭,星散而居。国主晟(太宗)尝浴于河,牧于野,屋舍、车马、衣服、饮食之类与其下无异。”^[2]说明在金朝初期,女真人的服饰并没有严格的等级差别。前述早期女真人服饰衣着的不同只是按其所拥有的社会财富不同而出现的。金政权进入汉地以后,效仿辽、宋之制,制定了区分等级的服饰制度。如在官服的色彩和花纹上,规定“文资五品以上官服紫。三师、三公、亲王、宰相一品官服大独科花罗,径不过五寸,执政官服小独科花罗,径不过三寸。二品、三品服散搭花罗,谓无枝叶者,径不过寸半。四品、五品服小杂花罗,谓花头碎小者,径不过一寸。六品、七品服绯芝麻罗。八品、九品服绿无纹罗。”^[6]以不同的颜色和不同品种的花卉标志品官等级的不同,反映了官服的等级性。女真人服饰的等级性还表现在,不同群体的衣着不同。据《金史·舆服志》记载:大定十三年(1173年),“太常寺拟士人及僧尼道女冠有师号、并良闲官八品以上,许服花纱绫罗丝绸。”^[6]而庶人则“止许服霰绸、绢布、毛褐、花纱、无纹素罗、丝绵,其头巾、系腰、领帕许用芝麻罗、绦用绒织成者,不得以金玉犀象诸宝玛瑙玻璃之类为器皿、及装饰刀把鞘、并银装钉床榻之类。”^[6]“兵卒许服无纹压罗、霰绸、绢布、毛褐。”^[6]“奴婢止许服霰绸、绢布、毛褐。”^[6]“倡优遇迎接、公筵承应,许暂服绘画之服,其私服与庶人同。”^[6]金朝女真统治者对于士庶、三教九流、兵卒、奴婢的着装的不同规定,反映出了其服饰具有明显的等级差别。当然,女真人也按社会地位的

不同遵从等级区别着装。

2 影响金代女真人服饰变化的因素

服饰是一定时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综合反映,它的发展变化总是受到各种社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金代女真人服饰由初期到入主中原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与金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

2.1 金代经济的发展

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女真人服饰的变化有着重大影响。在对辽、宋战争期间,北方社会经济受到了严重的破坏。金熙宗与南宋议和,使金代取得了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金世宗大定年间又采取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使得金代的经济呈现出全面复苏和发展繁荣的新景象。

在农业方面,农田面积不断扩大,出现了“中都、河北、山东、久被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垦”的景象。^[7]农作物的种类也不断增加,农业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也在继承辽宋的水平上有所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女真族所建立的金朝对桑蚕业十分重视。金朝规定:“凡桑枣,居民以多植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分之三,猛安谋克户少者必课种其地十分之一,除枯补新,使之不阙”^[6]。女真统治者对桑蚕业的大力提倡,不仅促进了金代农业的发展,也为金代的纺织业提供了大量的原料。

占领辽、宋旧地以后,金代的手工业也有较为充分的发展,女真人继承了辽和北宋的纺织技术和工艺,使得与服饰有关的纺织业有了较大的发展。金政府在真定、平阳、太原、河间、怀州等五处设置绫锦院,并派官员专门管理织造及常课诸事。除了官营纺织作坊绫锦院之外,金朝境内还有大量的私营纺织作坊,所生产的纺织品种类非常丰富,各具特色。据《金史·地理志》记载,平州贡绫,涿州贡罗,河间府产无缝绵,东平府产丝、绵、绫、锦、绢,大名府产皱、縠、绢,相州产縠(是一种印花的丝织品),平阳府产隰州绿、卷子布,东京辽阳府产“师姑布”。发达的纺织业丰富了金代女真人服饰质料。同时,金与南宋等地区的榷场贸易也使得金朝从

南宋获得了较多的丝织品,这些丝织品为女真贵族服饰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

总之,金代入主中原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以及与宋经济贸易的往来都为金代女真人的服饰变化提供了条件。

2.2 金代多民族文化的交流

女真人进入中原后,其服饰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除了受当时社会经济的影响,更是吸收、融合了先进的汉民族文化和其它少数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的结果。这种民族间的融合是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文化交流来实现的^[9]。

首先,大规模的移民,增进了女真人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在对辽与北宋作战期间,女真统治者曾将部分汉人迁往金朝内地,“天辅六年(1122年),既定山西诸州,以上京为内地,则移其民实之。”^[10]“七年(1123年)取燕京路,二月,尽徙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10]。同年四月,又将“燕京豪族工匠,由松亭关徙之内地”^[10],天会元年(1123年),“以旧徙润、隰等四州之民于沈州之境”^[10]。占领中原地区以后,女真统治者为了加强对中原的统治,曾将大批“猛安谋克户”迁入汉地。日本学者外山军治在其《金朝史研究》一书中认为,从金初至海陵王迁都燕京,前后移居中原的女真人数逾百万。^[9]这种民族间大迁徙,虽有一定的强制性,但却使女真人与汉族人民相互杂处,有更多的机会相互接触、学习和交流,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的联系与融合,也必定对其服饰产生一定影响,前述女真人服饰汉化倾向明显即是民族间交流的结果。

其次,聘使的往来,促进了宋金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有金一代,金朝与周边王朝尤其是宋之间聘使外交往来十分频繁。据统计,自1117年—1217年的百余年间,宋金双方相互出使,宋方为五百多次,正、副使有名可查的为484人。金方有295次,正、副使有名可查的为291人^[10]。这些使者有的被金长期扣留,被金朝授予官爵,有的参与金朝典章制度的制定。如宋朝使者宇文虚中和蔡靖就曾参与金朝典章制度的制定。“自古享国之盛无如唐室。本朝目今制度,并依唐制、衣服官制之类,皆是自宇文相公(宇文虚

中)共蔡太学(蔡靖)并本朝数十人相与评议”^[9]。宋朝使金的使者不仅将先进的汉文化带到金朝,就连他们的衣着服饰也引起了金人的羡慕。如范成大出使金朝时,金国接送伴田彦皋对他所带的巾裹非常羡慕,求其式样,而对自己所带的“蹋鸱巾”则颇有愧色。“蹋鸱巾”是金人的一种头巾,而金人田彦皋却对范成大的巾裹十分羡慕,反映出了女真人对汉人服饰的仰慕。

3 结语

一个民族的服饰是随着其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发展而日趋华丽和完善的。受金代经济的发展以及大规模的移民、聘使的往来等不同形式的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影响,金代女真人的服饰由早期到入主中原以后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金代女真人服饰的变化可以概括为:服饰制度的形成;整体上看女真人服饰由简朴变奢华;衣着汉化倾向明显;具有严格的等级性。通过对女真人服饰的变化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从侧面了解金代女真族的发展轨迹。

参考文献:

- [1](宋)洪皓.松漠纪闻[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39.
- [2](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6:553,552,151.
- [3](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6,730-731,1177.
- [4](元)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74,74,976,975,198,985,199,282,985,983,986,986,986,986,987,1042,1032,1033,41,1033.
- [5]黑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阿城巨源金代齐国王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9(10):1-10.
- [6]宋德金.中国历史·金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57,356,357.
- [7]王德朋.金代商业经济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33.
- [8]高福顺.北方民族政权历史文化认同的典型个案——《辽金元史学研究》评[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3(1):1-4.
- [9]韩育臻.金朝文化政策成因探析[J].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7(4):78-84.
- [10]董克昌.宋金外交往来初探[J].学习与探索,1990(2):133-140.

[责任编辑:姜 冷]